

董 从 林 著



历史
关键
之年
丛书



变政与政变

—— 光绪二十四年聚焦

河北大学出版社



历史关键
之年丛书

董丛林 著

变政与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聚焦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文京
封面设计:张志伟
责任校对:杨金花
责任印制:闻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政与政变/董丛林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3
ISBN 7-81028-503-3

I.变… II.董… III.历史事件-史评-中国-1898 IV.K256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780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1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 (850mm×1168mm)

印张:8

字数:200千字

印数:1~6000册

版次:1999年3月第1版

印次:1999年3月第1次

定价:13.00元

出版说明

历史不能没有激情。历史的长河不会没有浪花。在历史的发展中,有许多年份给人留下抹不去的记忆,王朝更迭,革故鼎新,霹雳政变……这些具有“转折”或“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关键”而复杂的影响,使历史饱满而又摇曳多姿。为再现历史的“关键”,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历史关键之年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丛书不同于传统的史学教科书、史学论著,也不是某一年人物事件记录的“流水账”,或人物事件简单的罗列堆积,而是淘洗新材料,切入新视角,用清新可读的散文笔调展示历史,述说人物,使人深思,给人启迪,令人遐想。

丛书各册均以时间为经,以重要人物或事件为纬,选取若干重要之点,以点带面,连缀成书,人物、事件、时空,纵横交错,上接下连,有立体感、整体感,力图再现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丛书不是通“俗”读物，虽然写作手法灵活多变，但不失历史之尊。求“真”是本丛书的重要目的。

“历史关键之年丛书”第一辑共4种：《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余同元著）、《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池子华著）、《变政与政变——光绪二十四年聚焦》（董丛林著）、《彷徨与顿悟——一九一九年实录》（张同乐著）。

丛书从酝酿到出版，历时两年有余，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读者给予批评。

目 录

代引言 题解短语	(1)
上篇 变政的前奏	(5)
1. 西花厅里的亮相	(7)
2. 紧锣密鼓策“圣主”	(18)
3. “分割洊至”的危迫	(29)
4. “会为保国,岂不甚善”	(40)
5. 京城之外的激荡	(50)
6. 诡谲微妙宫廷间	(64)
中篇 不寻常的“百日”	(81)
1. 颁诏定国是	(83)
2. 一日之间	(91)
3. 终于见到了天颜	(101)
4. 新政舞步疾	(111)
5. 动真格的?	(123)
6. 文韬武略皆失灵	(133)
7. 几多疑案几多谜	(148)
8. 关此东洋客乎?	(158)
下篇 政变的劫难	(177)
1. 悲哉,瀛台囚!	(179)
2. 缙骑苍黄遍九关	(188)

3. 我自横刀向天笑·····	(198)
4. “兴革悉反之”？·····	(209)
5. 没有结成的联盟·····	(219)
6. 成败得失怎评说·····	(229)
尾声 怪圈不怪·····	(243)

代引言

题解短语

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才须待七年期。

——白居易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无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其重要和复杂的历史内容,用“变政与政变”来概括也许可以说得上提纲挈领,故取作书名。

“变政”作为“变法”的同义词,今天说来听来似乎不如后者顺口顺耳,但它也确是当年习用的词语,譬如说它出自维新派领袖和骨干人物口中笔下的频度就是相当高的,康有为就曾以“百日变政,万汇昭苏”来概括我们通常所说“百日维新”之时的宏观情势,分明是以“变政”来指称当时的维新变法,不能不谓典型。可知该词决非鄙人为求与“政变”字序上的正反对应而牵强拼造。

“变政”与“政变”,这文字形式上有着自然天成巧对妙趣的两者,其所连缀的特定历史内容,则如一出戏中喜悲迥异相反相成的前后两幕,展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中的一个曲折片断,又凝成蕴涵丰富而深刻的一个历史纽结,牵缠着时人和后世从未间断地探索索隐。

于今,距那个不寻常的年头正好百年。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华夏神州来说,这百年来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来鸟瞰那场历史风雨的陈迹,从中剥绎和领悟鲜活的启示意蕴。

这首先需要让那段历史在我们的心目中“复活”。“复活”的历史才不再是干瘪的木乃伊,而重新有了灵魂,有了血肉,有了动的场景,有了活的画面。当然,受史料遗存状况等客观条件和我们主观认识条件的双重制约,这种“复活”不可能是“复原”——既不可

能“复活”其“全部”而只能是“局部”，也不可能“复活”得绝对“真实”而只可能相对“近似”，并且还不免有解不开的疑窦，破不了的谜氛。本书便是对那段历史作个如此情形的“聚焦”。

这种“聚焦”所显示的，当然不是现场的写生，而是对异境的体察，往时的追溯；也不是成象的机械描摹，而是今人与历史沟通意境上的写真，离不开以我们的理念去撞击那面历史回音壁的反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B. Croce)的这句名言可谓从一个特定角度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属性。本书所“聚焦”的当年“变政与政变”的历史，当然也超越不了这一铁定法则。

至此，务虚性的题解话语已该打住，还是把思考和品评多留给尊敬的读者。

上 篇

变政的前奏

面对“外衅危迫，分割洊至”的严峻形势，以救亡为直接触发点，康有为辈开始掀动新一轮维新高潮。已不只限于舆论宣传和在野策动，也不仅仅与某些帝党官员连鑣并轡，他们开始引起光绪皇帝的注意和借重，一个前所未有的“神圣同盟”开始形成。与京城的漩涡中心相应和，一些地方也波涛激荡。然而，宫闱内外，被复杂的派系网络牵缠，形势诡谲叵测。

1. 西花厅里的亮相

戊戌大年初三(1898年1月24日),京城里依然弥漫着一派浓烈的节日气氛。总理衙门的西花厅却无缘再享休闲的宁静,在这里,几个“大臣”与一个“小臣”正在进行着决不轻松的问对论政。

在场的“大臣”为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五人。虽说他们也是地位高下不等,权势轻重有差,但都是总理衙门大臣,起码官至部堂、疆吏,别说或更要充军机,荣列相国,贵为帝傅。岁数上,长者早已年逾古稀,最小者也正当花甲。相比之下,不论是官职地位还是年齿,这个“小臣”之“小”,确乎名副其实——他,康有为,中进士尚不满三载,授区区六品工部主事亦未实就,一介“游士”而已,年方四十有一(按当时通行虚岁计,下同)。那么,如此一位“小臣”,怎地和一班“大臣”坐到了一起谈论朝政国事?

别看康有为在朝臣中数小字辈,但对于方兴未艾的维新运动来说,堪称能呼风唤雨的大师。在维新之路上,他已经进行了多年求索,留下了一行清晰的足迹,一直连通到这目下的西花厅里。

这个于咸丰八年(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下一个士大夫家庭,自幼领受传统教育,博得“圣人为”绰号的士子,在二十多岁上有了游观香港、亲身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的经历之后,开始着意探研西学,通过中西比较寻求救国强国之道,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利用在京第二次参加顺天乡试(第一次是在光绪八年即1882年)的机会,曾单骑出居庸关,至八达岭,登上万里长城,居高极望,大有“山河人民之感”,思忖自中法战争以后,国势日蹙,若及时变法,或犹可支持,否则拖延下去,错过

时机，再欲为之，势必无及，于是“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①。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向当政者发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呼吁。在当时大多朝士的心目中，像康有为这样一个无名鼠辈，竟然要上书皇上指论国政，简直是迷狂之至，对他极尽嘲讽攻讦之能事，哪里还愿意为之代递上书。倒也有几个想帮忙的臣工，但权能有限，再加上阴差阳错的一些不利之事的凑合，书并未能上达，还连累得考试成绩本不错的他此科名落孙山。康有为的心头自然充满了遗憾和悲愤，他赋诗抒怀：

沧海飞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
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
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
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②

显然，康有为也不失自负：他自觉得是突出于“诸山”的“高峰”，是怀才不遇遭受迫害的杰士，同时更是蓄志来日能救国济世的圣手。但无论如何，眼下他在京城里是百般窘困，没有一点儿用武之地了，只好回到南粤家乡谋图秣马厉兵。

他做不了“山大王”。他最得心应手的“兵器”是一管狼毫。与之相辅相助，还有他的一张利口。当然，指挥他这管笔和这张口的，是他那一刻也安顿不了并且最擅长异想天开的头脑。这些也许就是他的全部本钱？噢，也不要忽略，除此而外，康有为这时还具备了另一种无形资产，那就是他惊世骇俗的上书之举所造就的“名气”。尽管在“常人”的心目中，他所出的不过是“狂名”、“恶名”甚至“骂名”，但这也已足以使他显示出“非常”。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人的理解、敬慕和追随。于是，他的门下，水到渠成地逐渐聚合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弟子。这就是康有为“羊城（广州）设馆”，更通常是说“万木草堂”讲学的由来。如果说其正式发端是以光绪十

七年(1891年)在长兴里开馆为标志,那么在这前一年,即有了陈千秋和梁启超相继向康氏拜师从学的先导。

“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的确,康有为所开设的,决不是一所普通学馆,而是编织了一只造就维新人才的摇篮;康有为所充当的,也决不是一名仅在学事上解惑授业的教书先生,而更是在思想上引领蹊径的政治导师。日后的维新骨干中,不少人是出自这所不寻常的“草堂”。至于康有为这期间在弟子们协助下锻造成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当然要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者于光绪十七年问世,后者迟至光绪二十四年才刊出):一则釜底抽薪般地把传统上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典,一下子“考证”为“伪经”;一则把灵光熠熠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冷不丁改扮成了进化改制的鼻祖。这一破一立之间,玩了一个多么玄妙的政治魔术!而所凭借的,却是一副“学术”的道具。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也该叹服,这位康先生真是一位借学言政的高手!

康有为又决不惮于不失时机直截了当地亮政治牌。更为人熟知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所领导的“公车上书”,便是很典型的一局。此前光绪十九年(1893年),康有为再次参加乡试获中举人,次年他与梁启超一起赴京会试(此前梁启超已参加过会试未中),双双落榜,来年再举之际,便有了“公车上书”事情的发生。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创巨痛深而又空前惊醒的年头。严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噩耗,刺激一切有痛感、有良知的国人发出挽危救亡的呼号,而“公车上书”,便是这中间的最强音,同时也是最富理性的声音。由康有为用一昼两夜亲自拟成的洋洋洒洒一万四千余言的“书”稿,不只是对国难当头的哀痛和悲愤的宣泄,而且提出了一套变法维新的方案:一要“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要“迁都定天下之本”,三要“练兵强天下之势”,四要“变法成天下之治”,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后一项则为最根本的“立国自强之策”。提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教民三个方面,每个方

面都列出了若干具体措施。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的消息惊动了京城，顽固守旧大臣们气急败坏，他们大肆攻击康有为蛊惑人心，乱政乱法，并在应试举人们中间进行反宣传，甚至公然进行恫吓，以致最后实际签名者仅六百余人。负有呈递面上书之责的都察院以朝廷已在《马关条约》上用宝（盖印），事已成定局，无可更易，拒绝接受上书，皇帝当然也就未能看到。不过，上书之事以及书之内容在朝野上下纷纷传论，真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

上书被格，但康有为在这次会试中报捷，中了进士。正考官徐桐，作为顽固派的典型人物，当然对康有为恨之入骨并欲极力压制。据说因为康有为在这次应试中故意大变文风，以致存心格之的徐桐未能识得其卷，而本已得副考官李文田激赏的梁启超卷，反被徐桐看出有背绳尺之处，疑为康卷，遂扼而不录。揭封后，才明了康得中而梁未中的事实，但正副考官还是联同尽量压低康的中式名次。

康有为中进士后被授工部主事，他不愿做一介供人驱使的小吏，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故不到署，继续从事他的维新变法活动。在公车上书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又第三次、第四次上书（公车上书因是由康有为策动、领导并亲自拟稿的，故作为他的第二次上书）。第三次上书被呈递到光绪皇帝手中，康有为的变法呼吁和筹策受到皇帝重视。第四次上书“言变法曲折之故，凡万余言，尤详尽矣”^③，特别是正式提出了“设议院通下情”^④的主张。但这次上书又受到顽固派大臣的刁难，几经辗转，终无人肯代呈，因此未能上达皇帝。

如果把“公车上书”作为维新运动正式开场的标志，那么，在此之后，迅速形成学会林立、报刊盛行的局面，则显现出运动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中间，康有为是无形的灵魂，有形的旗帜。然而，维新运动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康有为于当年秋出京，辗转到